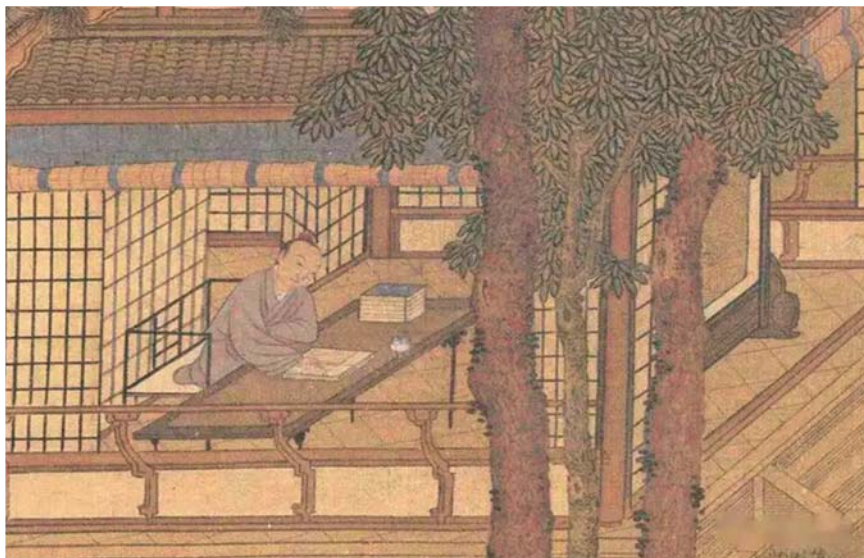


今年的四月第四周,是国家确定的首个“全民阅读活动周”,旨在鼓励全民阅读,提升全民素质。在宋代,读书人既有为实现“治国平天下”之理想的,又有积极追求修身齐家品格的,同时还有诸多以读书为爱好,或以读书为乐的普通人。

□陈保琳



宋朝人的读书心得： 朝经暮史，昼子夜集

至哉之乐，终日在书案

宋朝建立后,确立了以文治天下的祖训,科举纳才选仕,给予文人较高的政治地位和优厚待遇,激发了人们的读书热情。

宋代文人有文曰:“某平生有三愿:一愿识尽世间好人,二愿读尽世间好书,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。”欧阳修也曾感叹,“至哉天下乐,终日在书案。”诗人黄庭坚更是指出读书的重要性:“士大夫三日不读书,则理义不交于胸中,便觉面貌可憎,语言无味。”

尤袤为南宋常州无锡人,官至礼部尚书,他不仅仕途显达,且家富藏书,精通版本,嗜好金石碑刻,在无锡建有藏书楼“遂初堂”。尤袤博览群书且记忆力超群,每日公务结束后便闭门谢客,坚持手抄古籍。南宋历史学家李焘对尤袤的读书乐趣曾有生动记载:“延之于书靡不观,观书靡不记。每公退则闭户谢客,日记手抄若干古书。其子弟及诸女亦抄书。一日,谓子曰:吾所抄书,今若干卷,将汇而目之。饥读之以当肉,寒读之以当裘,孤寂而读之以当朋友,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。”

宋人勤奋读书,更讲究方式方法。欧阳修提倡“枕上、厕上、马上”的“三上读书法”。苏轼总结出各个击破的“八面受敌法”:“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”“每次作一意求之”,不分散精力“八面出击”,而是集中优势兵力,一次只攻克一个方面,实现各个击破,最终达到对全书内容的全面、精深掌握。还有朱熹主张的“口到、眼到、心到”的“三到读书法”等,至今仍有借鉴意义。

宋人还发明了“日课”读书法,广为时人接受。南宋理学家、文学家吕祖谦说过:“为学之本,莫先读书;读书之法,须令日有课程。”南宋学者倪思说:“观书一卷则一卷之益,观书一日则有一日之益。”

南宋进士郑耕老根据“九经”字数安排日课内容:“今取《六经》及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孝经》,以字计之……大小九经合四十八万九千字。且以中材为率,若日诵三百字,不过四年半可毕。

或以天资稍钝,中材之半,日诵一百五十字,亦止九年可毕。苟能熟读而温习之,使入耳着心,久不忘失,全在日积之功耳。”

宋人还根据不同生活情境安排相适宜的阅读内容。南宋学者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载:“(邵)康节先生劝学曰:二十岁之后,三十岁之前,朝经暮史,昼子夜集。”欧阳修《归田录》也载:“钱思公虽生长富贵,而少所嗜好,在西洛时,尝语僚属言:‘平生惟好读书,坐则读经史,卧则读小说,上厕则阅小词。’”

大诗人苏轼被贬黄州时,仍然坚持读书日课。即便朋友来访,也要坚持完成日课再待客。据《道山清话》载:苏轼在雪堂每天都要读诸子百家,前人诗文无所不读,他特别喜欢杜牧的《阿房宫赋》《过华清宫》,每读完一遍便嗟叹不已,到深夜也不能入睡;他甚至把《过华清宫》等诗作抄了三四十本。

贪道义而非贪利禄

宋代学术氛围浓厚,众多学者包括朱熹、程颢、程颐等讲学授徒,著书立说,他们的思想和学说在社会上广泛传播,吸引大量学子前来学习和探讨。

读书人研读儒家经典,对社会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,他们往往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。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范仲淹曾挥笔写下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。居庙堂之高,则忧其民;处江湖之远,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,退亦忧,然则何时而乐耶?其必曰: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慷慨豪歌。范仲淹对读书痴迷不休,尽管他幼时家境贫寒,依然坚持读书,据宋魏泰《东轩笔录》记载:“惟煮粟米二升,作粥一器,经宿遂凝,以刀画为四块,早晚取二块,断齋数十茎,酢汁半盂,入少盐,暖而啖之。”这个记载是说,少年范仲淹生活十分清苦,每日用两升小米煮粥,隔夜粥凝固后用刀一切为四,早晚各吃两块,再切一些腌菜佐食。生活如此清苦,但范仲淹依然坚持读书学习,最终成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。对于范仲淹的情怀,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高度赞扬他:“公少有大节,其于富贵、贫贱、毁誉、欢戚,不一动其心,而慨然有志于天下。”

毁誉、欢戚,不一动其心,而慨然有志于天下。”

北宋思想家、教育家张载认为:“学者当须立人之性。仁者人也,当辨其人之所谓人。学者学所以为人。”就是说,要通过读书学习,提高道德修养,去除气质之恶,复归天地之性,堂堂正正做人,由此他提出了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的旷世名论。

居何以待,案上书千卷

宋代读书热的兴起,带动了印刷术的重大突破,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提高了书籍的印刷效率,降低了成本,使书籍得以大量印刷发行。据史料记载,宋代印刷书籍的数量远远超过前代。

当时书籍出版交流传播更快更丰富,私人藏书甚是盛行,出现大批藏书家。特别是士大夫官僚阶层的收入稳定且较高,“白酒酿来缘好客,黄金散尽为收书”,那时的文人士大夫“尤嗜读书,所得禄赐,多以购书”。

宋代的藏书家不仅自己藏书、藏书,他们也愿意使一家之藏为众人所用。官至龙图阁直学士的宋敏求为宋仁宗时期的大藏书家,他家中的藏书竟达三万卷,在当时堪称之最,前来他家求书的人络绎不绝。他不仅经常与其他藏书家互通有无、共享资源,还乐于把自己的藏书向大众开放,借书与人读,所以当时喜欢读书的人们不仅到他家里借书,很多人更在其居住的春明坊周围赁屋建宅,“以便于借置故也”,致使春明坊地价房价大涨,高于他处,出现了“读书坊”的奇特景象。

宋哲宗时期的丞相苏颂,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天文学家与科学家,同时也是一位藏书家。他别出心裁,以书宴客,不仅可以借阅,还可以无偿抄走。他写了一首《客来》诗:“有客过我门,开颜喜相见。安居何以待,案上书千卷。高论到古人,终日自忘倦。非同豪富家,丝竹留饮宴。”当时的丹徒尉叶梦得就是他家的常客,从中借抄,获书甚多,对其后来人生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,所以叶梦得每与士大夫言此之幸,则对苏颂感激不已。

在明末清初的金陵(今南京),曾出过一个铁杆书迷。这位痴迷于读书、藏书且家中典籍宏富的藏书家叫黄虞稷,为方便读书他还专门订立了互换借书的君子协议。

黄虞稷(1629-1691),字俞邨。明代晋江(今泉州)人。从小受父亲熏陶,七岁能诗,且刻苦好学,嗜书成癖。其父黄居中一生酷嗜典籍,为官前就经常四处借书阅读,每得异本,即使鼠咬残破、蠹鱼蛀蚀,也无不珍重携归,并亲手补缀、抄录;为官后他的俸禄多用于购书。黄居中一生藏书达六万余卷,为了收藏这些书籍,他在金陵建“千顷斋”,其中以明人的著述最为齐备,上迄明代十六朝帝王大臣下至百姓文人诗文笔记,无不搜讨网罗。

定居金陵的黄虞稷,十六岁入县学,博洽群书。父亲去世后,母亲对他要求严格,“汝宜引避,有先人遗书在,当尽读之,勿躁也。”黄虞稷谨遵母命,一边慎守先世藏书,整理先父遗藏,“晓夜孜孜,不忘锄耨”;一边广搜博采,使家藏增至八万余卷,且多善本。

明末清初著名学者、大藏书家钱谦益的《黄氏千顷斋藏书记》中载:“戊子之秋,余讼系金陵,方有采诗之役,从人借书。林古度曰,晋江黄明立先生之仲子守其父书甚富,贤而有文,盍假诸?余于是从仲子借书,得尽阅本朝诗文之未见者。”连钱谦益这样的大藏书家到黄虞稷家中,都能读到未曾见的明代书籍,可见其藏书之独特和丰富。

为了丰富藏书,黄虞稷四处搜讨,每见善本,常常不惜重价收购,每当听说亲朋好友间有人得罕见之书或是善本,他一定设法借阅、抄录。

距离黄虞稷金陵“千顷斋”十余里的龙潭,有位著名的藏书家叫丁雄飞,藏书两万卷,黄虞稷经常去丁家借读、抄录,两人很快成为挚友。他们二人还制定了借书的君子协议,作为借读对方藏书时须遵守的行为规范:“每月十三丁至黄,二十六黄至丁。为日已定,先

读书迷黄虞稷的君子协议

期不约。要务有妨则预辞。不入他友,恐涉应酬,兼妨检阅。到时果核六器,茶不计。午后饭,一荤一素,不及酒。逾额者,夺异书示罚。舆徒每名给钱三十文,不过三人。借书不得逾半月。还书不得托人转致。”为了借书时招待对方,还要给对方的车夫赏钱。二人在约定的日子里,彼此总是尽出家藏本,谈书论学,互通有无,读书相长,相互质疑疑难,成就了藏书史上的一段佳话。黄虞稷也从丁家抄录了许多秘本古籍,大大地丰富了自己的家藏。

更可贵的是,黄虞稷还与明末清初官员、文学家、收藏家周亮工的儿子、藏书家周在浚商定,从各家精心挑选出唐宋秘本藏书九十六种,详细校订编写了《征刻唐宋秘本书目》一卷,刊刻发布,征求有实力的有识之士刊印出版。

此举得到许多学者的积极响应,后来清代最早阐释儒家经义的大型丛书《通志堂经解》就收录了黄虞稷、周在浚提供的经部书籍。接着,官纂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及私刊《知不足斋丛书》中,都刊印了《征刻唐宋秘本书目》中的绝大部分珍籍,使得许多本来很有可能亡佚的珍本古籍能够流传于世。

不仅如此,家学深厚的黄虞稷深谙经籍目录之学,在其父亲所编《千顷斋藏书目录》六卷的基础上,编成《千顷堂书目》三十二卷,目录之富,体例之严,冠于明代以后诸家目录。被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评价为:“考明一代著作,终以是书为可据。”

到清康熙十八年(1679),清廷开馆纂修《明史》,内阁大学士徐元文担任总纂修官,他听说黄虞稷“学问渊博,文笔雅健”,推荐其参与纂修《明史·艺文志》,黄虞稷所编纂的《艺文志稿》备受当时以及后世学者称赞;康熙二十八年(1689),他又被推荐参与编纂《大清一统志》。由此可见,在编纂典籍上,读书迷黄虞稷也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
